



# 深层心理学 与文学批评

王 宁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深层心理学与文学批评

王 宁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25 印张 2 插页 155 千字

1992 年 1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 7-224-02200-4/I·533

定价：4.00 元



王宁，男，1955年生，江苏省扬州市人。1978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后留校任助教、讲师等职。1989年在北京大学获英文和比较文学博士学位，1990年9月至1991年8月在荷兰乌德勒支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并应邀前往英、法、德、荷兰、比利时、葡萄牙、瑞士、奥地利等国家的十几所大学访问讲学。现任北京大学英语系副教授，并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后现代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等职。主要著作有《比较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与乐黛云合作）、《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乐黛云合作）等；主编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谈创作》、《精神分析》等译文集；主要译著包括《走向后现代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与文学思想》、《夜色温柔》等多种。此外，在中国、香港、美国、荷兰等国家和地区的四十多种刊物发表中、英文论文100余篇和大量译文、散文和随笔，广泛涉猎比较文学、文学理论、西方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学科和领域。

责任编辑 鲁小山  
封面设计 薛卫真  
版式设计 徐秦生  
封面照片 焦长虹

## 目 录

弗洛伊德主义的文学思考·····	( 1 )
精神分析学批评的兴起及发展演变·····	( 17 )
弗洛伊德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影响与流变·····	( 44 )
伊底和超我的两相对照 ——《金瓶梅》中两幅画面的精神分析学解读 ·····	( 68 )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弗洛伊德主义变体 ——三篇新感觉派小说的精神分析式解读·····	( 92 )
《雷雨》中的弗洛伊德主义因素 ——曹禺剧作新探·····	( 117 )
朱光潜与弗洛伊德·····	( 134 )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弗洛伊德主义变体·····	( 156 )
性爱的升华与毁灭 ——读罗·达尔的两篇小说·····	( 177 )
《夜色温柔》与弗洛伊德主义·····	( 188 )
<b>附录</b>	
《喧哗与骚动》中的内心独白 ····· [美国] 卡帕维尔·柯林斯	( 199 )
生命不息 探索不止 ——访维也纳弗洛伊德故居·····	( 221 )
<b>后记</b> ·····	( 227 )

## 弗洛伊德主义的文学思考

西方现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流派众多、追求时尚。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人的精神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对传统文化观念的反思，导致了多学科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从 19 世纪末起，文化界各个领域里就不断出现一些风靡一时的思潮，这些思潮中的代表人物打起“反理性主义”的旗号，公然向传统的观念挑战，同时又在不断地侵袭人们的思想。心理学作为“一门实验科学（从 1800 年起经过了 70 年）”<sup>①</sup> 而步入文化界以来，不断发展壮大，日臻成熟。新的流派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心理学本身的领域，进而波及到了人类学，语言学，生理学，美学和文学艺术。精神分析学派犹如异军突起，从一开始的一支“叛军”逐渐“扩展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逐渐变成了一种心理学的体系和无所不包的人生哲学”。<sup>②</sup> 作为这一学派的创始人，西格蒙·弗洛伊德的名字也随着“弗洛伊德主义”（Freudianism）这一术语的产生而蜚声文化界。

① 杜·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杨立能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2），第 3 页。

② 见高觉敷主编：《西方近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第 368 页。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弗洛伊德主义在心理学界并不十分受到推崇景仰，其影响倒是在文学界日增不衰。不管今天的“精神分析批评家”的理论与其创始人的学说相差多远，他们总不愿轻易抛掉“弗洛伊德主义”这个旗号，这就使我们感到有必要对弗洛伊德主义进行一番文学思考，以便探讨弗洛伊德对文学的接受和反馈，以及他的文学观点对当代文学的重大影响。

弗洛伊德主义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思想背景和文化背景。19世纪下半叶，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传播，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哲学开始衰落，到了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后，曾经鼎盛一时的德国古典哲学也进入了终结阶段。西方古典哲学的衰落导致了形形色色的新思潮、新流派的产生，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唯意志论宣扬人的意志无法在现实社会中得到满足，因而人生总是充满痛苦悲哀的；尼采则公开宣称“上帝已死”，把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发展到“强力意志”和“超人哲学”，公然否定基督教精神，开了反理性主义的先声；而柏格林森则坚持生物进化学说，鼓吹直觉主义，以神秘来代替生命的科学，斯宾塞走得更远，把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广泛地应用于人类社会，打起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旗号。所有这些思潮和学说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反对传统的理性主义，但却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对传统的文化进行反思。这些探索者们的理论不管正确与否，无疑都为弗洛伊德主义的产生创造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而弗洛伊



德则正是受了这些思潮和流派的启迪和影响，广纳百川汇集成流，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的。

弗洛伊德生前曾自诩为一位“科学家”，本着严谨的科学态度去探索人类精神生活的“黑暗大陆”——无意识，但是他的理论一经问世，就经历了各种褒贬不一的评论。贬抑者们不分青红皂白，指责他为疯子和“庸医”，对他的精神分析学说持根本否定的态度；而褒誉者们则高度评价了他在 20 世纪文化思想史中的地位，称他“和卡尔·马克思一样，提出了一种人类行为的学说，这一学说一开始是极不流行的，只有他自己才相信。同样也和马克思一样，他实质上采取的是哲学的方法，而不是科学的方法……不管未来的弗洛伊德主义研究者们修改什么原理，或者摈弃什么原理，它的中心论述将继续成为所有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的极其重要的一部分”。<sup>①</sup>应当承认，弗洛伊德的理论中确有不少谬误，有些甚至是十分荒唐可笑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他本人对性问题的探讨是十分严肃的，而且他的精神分析学说也有着一定的临床实践基础，因而在治疗精神病过程中也确实取得过一些成功。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弗洛伊德也和历史上另一些哲学家一样，他们的一些哲学断想虽然在自然科学领域不失为真理，但一旦被广泛推广到社会历史学科，就暴露出了其唯心主义的实质。弗洛伊德的文学观点的形成，主要是基于他对西方古典文学名著的鉴赏和分析，因此假想的哲学推断成分大大多于冷静的科学分析成分，这样失之偏颇也就不足为

---

<sup>①</sup>见 R. W·霍顿等著：《美国文学思想的背景》（第 3 版，新泽西），第 356 页。

奇了。

既然弗洛伊德与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探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一直是一个有趣的课题，在这方面已有不少精辟的专论，笔者也曾作过一些尝试。<sup>①</sup>这里就不妨引用一段西方公认的弗洛伊德研究权威莱昂耐尔·特里林的评论：“弗洛伊德对文学的影响一直是十分巨大的，这一点当然是确信无疑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相当普遍深入的，因此其限度是难以确定的；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常常是歪曲滥用或者荒谬地简化，它已经渗入到我们生活之中，并成为我们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对于这一点，此时还难以明确地意识到”。但是，这种影响是“相互的，弗洛伊德影响文学，文学也同样影响着弗洛伊德”。<sup>②</sup>弗洛伊德与文学之关系的渊源，还得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他从小就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19世纪初风行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极感兴趣。他最喜爱的作家有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歌德、陀斯妥耶夫斯基、吉卜林、马克·吐温、托马斯·曼、茨威格、罗曼·罗兰等。他在《自传》中毫不掩饰地写道，他在文学上最崇拜的偶像是歌德。他曾怀着极大的兴趣反复阅读了《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作品，后来由于其散文文体清新优美而获得1930年的“歌德文学奖”。这一切均为他潜心研究世界文学名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①参阅拙作：《论弗洛伊德的文学观点及其对西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第5期。后收入《弗洛伊德心理学与西方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6月。

②见莱昂耐尔·特里林的论文，《弗洛伊德与文学》，收入《自由想象》一书（双重时代公司，1953）。

严格说来，弗洛伊德并未出版过一部论文学的专著，专论文学艺术的文章也只有这样一些：《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幽默》（小册子）、《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列奥纳多·达·芬奇：孩提时回忆的性特征研究》、《陀斯妥耶夫斯基与弑父》、《妄想与梦》等。在这些专论和另一些著作中，弗洛伊德针对审美、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等问题，提出了一些精辟的见解，对现当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根据个人粗浅的研究，将其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作的动因——力比多。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文学创作的动因是力比多，即性欲，作家艺术家从事创作是因为要满足他们“本能的欲望”，这些欲望中最强烈的就是性欲。艺术家也和一般人一样，由于欲望长期受到压抑而得不到满足，致使他们郁郁寡欢，试图在文艺创作中得到感情的宣泄，寻找欢乐，因此他们的创作动因就是这种“性欲的冲动”。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美”这个概念植根于性冲动之中。而人类的审美活动则围绕着性冲动来进行，从性欲中获得“美的享受”。这种看法当然是偏激的，与文艺创作的规律不符合的，因此一些批评家总喜欢将充斥西方文坛的当代文学的一些描写色情和凶杀的作品与弗洛伊德的文艺观联系起来。

（二）创作活动——无意识或自由联想。无意识说是精神分析学说的核心部分，这一点也突出地体现在他的文学观点中。早在他治疗精神病患者时，就开始实践这一学说了。他把人的精神领域分为三个层次：前意识、意识和无意识，而无意识则是“一个特殊的精神领域，它具有自己的愿望冲

动，自己的表现方法以及它特有的精神机制”。艺术家的任务不仅是要表现人的意识活动，而且还要深入到那深不可测的无意识中去，探索心灵的奥秘，以揭示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达到心理上的真实。而非浮于表面的真实。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说确实为我们的文学艺术家开辟了一个广阔的表现领域，把文学作品中的心理分析手法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所谓“自由联想”就是让病人躺在沙发上。“自由联想”，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胡言乱语、疯子般的语无伦次的呓语及梦中的语言一古脑儿从口中涌出。弗洛伊德在阐述作家的创作活动时，便把这种自由联想与艺术想象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与想象没什么区别”。他的这种自由联想说，从两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威廉·詹姆斯开创的意识流理论。第一，正常人在睡梦中的意识流——自由联想；第二，精神病人神经错乱时的不合逻辑的语言。前一种通常叫做睡梦中的意识流，后一种则可称为醒来时的意识流。我认为，这一理论对沟通现实与幻想之间的交流，无疑起了重大的作用。纵观 20 世纪的西方文坛，采用意识流手法写作的艺术大师层出不穷，其手法也日益趋于圆熟老练，变化多端。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弗洛伊德的这一观点对 20 世纪的东西方文学创作有着卓越的贡献。

(三) 人物的塑造——“升华说”。“升华”一词原为物理学和化学中的一个术语，指固体物质未经转化为液体就径直“上升”为气体的变化。弗洛伊德借用了这一术语，专指“自我”的活动冲破压抑而得到充分的表现。按照这一观点，艺术家从事文学创作，纯属本能欲望的冲动进而升华的结果。“升华说”用于文学创作中，其作用体现在“把内心

的冲突塑造成外部的形象，”<sup>①</sup>主人公的形象通过其自我活动和升华而得到真实的刻画。受弗洛伊德影响的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托马斯·曼、罗曼·罗兰等人就有意识地在自己的作品中运用这一观点，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发掘探测，通过冗长细腻的心理分析，使人物的内心外向化，进而升华到一个优雅完美的境地。这对于扩大塑造人物的角度，揭示人物性格的不同层次，使之丰满可信，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

(四) 创造主题和批评方法——“俄狄浦斯情结”。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的主人公俄狄浦斯不知不觉地应验了神灵的预言，走上杀父娶母的道路，最后导致了命运的悲剧。弗洛伊德深谙古典文学名著，“根据自己对古希腊悲剧的知识，提取了这个与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故事的相似之处，从而为乱伦的欲望发明了‘俄狄浦斯情结’这一术语。”<sup>②</sup>他从卷帙浩繁的世界文学名著中，举出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以及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为例，指出这三部作品竟有着同一个主题：“俄狄浦斯情结”，俄狄浦斯王之所以“杀死父亲莱厄斯，娶母亲乔卡斯塔为妻，纯属一种愿望的满足——，我们的孩提时代愿望的满足”，《哈姆雷特》“也植根于与《俄狄浦斯王》相同的土壤中”。<sup>③</sup>他的这些论断对后来的精神分析学派批评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①见弗洛伊德：《释梦》（伦敦，1900），第35页。

②见《美国文学思想的背景》，第350页。

③引自伊狄斯·库兹威尔等编，《文学和精神分析学》（纽约，1983，）第29，31页。

对于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悲剧作品的主题，有着某种启迪作用，但是如用它来解释任何一部作品，其中就必然会显出谬误和荒唐之说了。

(五) 文艺创作与白日梦。弗洛伊德除了提出无意识和自由联想的理论外，还将文艺创作与白日梦作了比较。他认为，创造性作家无异于一个白日梦者，“我们十分明白，许多富于想象力的作品与天真幼稚的白日梦模特儿相距甚远”；“如果我们把富于想象力的作家与白日梦者、将诗歌创作与白日梦相比较并显示出有何价值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首先让它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表明，自己是卓有成效的”。<sup>①</sup>弗洛伊德认为，作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利用现成的材料，例如古代史诗的作者，另一种则是创造性作家，即在“光天化日下”做白日梦、创造出艺术材料的作者。而他本人则更喜欢后者，因为他们将自己的白日梦诉诸艺术形式，然后转达给读者，给读者以审美的愉悦和享受。他的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在号召作家突破现实生活的界限，充分发挥创造性和主体作用，创作出富于想象力的艺术作品。我以为这对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来说，有着一定的可取之处。

(六) 艺术家与精神病。作为一名行医的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还探讨了艺术家与精神病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一切艺术都是精神病性质的”，而“艺术家就如一个患有精神病的人那样，从一个他所不满意的现实中退缩下来，钻进他自己的想象力所创造的世界中。但艺术家不同于精神病患者，因为艺术家知道如何去寻找那条回去的道路，而再度地把握着

---

<sup>①</sup>见《文学和精神分析学》，第26，27页。

现实”。<sup>①</sup> 这就不言而喻地表明，艺术家在从事创作时，虽然进入了高度的专注状态，如醉如痴，恰像一位精神病人，但他始终有一种理智在控制着自己的神经系统，不致于使人堕入精神病的深渊。这其实和柏拉图所鼓吹的“迷狂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所不同的是，弗洛伊德用了一个医学上的术语对之作概括罢了。由此可见，弗洛伊德在提出自己的假设时，总试图将其建立在自己的精神分析学的“科学实验”基础上，使之科学化、概念化。而他对文艺作品的分析，却又是从直觉印象或鉴赏入手，因此提出的看法难免失之偏颇。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弗洛伊德并不是一个有着系统理论修养的批评家，他虽然对文学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毕竟缺少严格系统的训练，所读作品也只限于个人爱好。此外，他的文学观点缺少坚实的哲学方法论和美学基础，因此常常容易受到攻击或歪曲或甚至误解。例如，他本人素来对性的问题十分严肃，从未发生过“风流韵事”，但他在对性问题进行探索时，却又无限制地夸大了性的作用，因而在这个问题上他屡遭攻击甚至谩骂；他本人虽反对非理性主义，主张科学和理性，但由于在强调无意识对文学创作的作用时，忽视了意识的作用，因而被人误解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本人最喜欢的作家大都是现实主义作家，对他们的精湛写作技艺深感钦佩，但他的文学观点却更受现代主义作家推崇，他本人也因而被奉为他们的“精神领袖”；他在比较艺术家与精神病人时原想提出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以

---

<sup>①</sup>转引自高宣杨，《弗洛伊德传》，南粤出版社，1980年版，第269页。

说明艺术家在创作时是有理智的，但却被人误解为将这两者蓄意混为一谈。弗洛伊德是一个复杂的充满矛盾的人，他的理论也包罗万象，庞杂无章，因而也是矛盾的，他对文学艺术的见解虽有启迪人的作用，但也时常陷入这种难以自圆其说的窘境之中。但是，我们应该承认，弗洛伊德敢于另辟蹊径，走前人未敢涉足的地方，探索几千年来被人视为禁区的处所，并大胆提出自己的假想和推论，这种大无畏的进取精神本身就是令人赞叹的。况且，他的理论中还蕴含着不少合理的因素，其中有些经过几十年时间的考验，已成为作家艺术家创作中不可缺少的指导思想，因此，简单的否定或不加批判的接受看来都是不足取的。

那么，弗洛伊德究竟对文学有多大的贡献呢？他究竟在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什么样的地位呢？眼下作出定论还为时过早。苏联学者维戈茨基在对精神分析学作了一番考察后指出，“弗洛伊德本人的唯一过错，是他试图把文学作品的主人公的假梦当作真梦来解释。这反映了他对待艺术作品的幼稚态度……总的说来，这些东西可以归结为：提出了无意识，即扩大了研究范围，指出了艺术中的无意识如何成为社会性的东西”。<sup>①</sup>这种看法是比较客观的和实事求是的，但还不足以概括弗洛伊德对文学艺术的贡献。美国学术界则又前进了一步，认为通过“三位德语国家的思想家尼采、弗洛伊德和荣格，奠定了心理学批评的基础，尼采阐述了悲剧的心理特征，弗洛伊德在对人的心理分析研究中，发现了艺术家的特

---

<sup>①</sup>列·谢·维戈茨基，《艺术心理学》（周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第106页。



殊地位；而荣格则用一系列种族无意识原型的陈述来看待艺术”。<sup>①</sup>我认为，在西方文论 2500 年历史上，弗洛伊德是少数产生了如此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这不仅是因为他的理论丰富了美学理论的宝库，而且还因为他的文学观点对具体的创作和批评实践有着指导作用（不管这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他的泛性论、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说影响了好几代作家的创作思想；他的无意识、梦幻和自由联想说则开阔了作家的视野，丰富了创作的技巧；他的精神分析法、人格说和俄狄浦斯情结则成了精神分析学派批评家的批评武器，并且这一学派至今仍有壮大和发展的趋势。因此我们切不可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无视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

## 二

如果我们并不否认弗洛伊德主义文艺观的重要性和巨大影响的话，我们还应当意识到，这种影响表现在多方面，涉及到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各个领域。单从 20 世纪的西方文学来看，我们就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当然是重要作家）来。其中小说家有杰克·伦敦、德莱塞、劳伦斯、乔依斯、伍尔芙、普鲁斯特、卡夫卡、海明威、福克纳、菲茨杰拉德、路易森、弗兰克、托马斯、安德森、托马斯·曼、罗曼·罗兰、茨威格、索尔·贝娄等；诗人中则有里尔克、庞德、艾略特、杰弗斯、佛洛斯特等；剧作家有斯特林堡、梅特林克、奥尼尔、荒诞派戏剧、以及萨特这样的作家兼思想家。从上

---

<sup>①</sup>引自《美国百科全书》，1980年版，第8卷，第223页。